

待免軒文序

一 说文卷一

待免



待免軒文序

李庚



—
说文卷
—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待兔轩文存·说文卷 / 李零著.

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5.6

ISBN 978-7-5495-6263-3

I. ①待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汉字—古文字学—文集

IV. ①C53 ②H12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309831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 何林夏

出 品 人: 刘瑞琳

责任编辑: 吴晓斌

装帧设计: 彭振威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: 276017

开本: 960mm × 1340mm 1/32

印张: 13.375 字数: 380千字

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8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我有个梦想的书屋，四面敞亮，一直在心中。真实的办公室呢，则是学校所赐，暂时借给我，地点在北大老化学楼的三层，挨着女厕所，很小。我刻了块匾，不好意思挂起来。

我说，北大有个临湖轩，我有个临厕轩。

“待兔轩”是我的斋号，命室之由见我的小书：《何枝可依》（《待兔轩读书记》的第一种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9年）。在那本书的自序中，我讲了个故事，这里不再废话。

我是个为兴趣而读书而写作的人，书是副产品。我从没想过读多少书才算合适，也从没想过写多少书才算合适。读书写书，只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，玩哪儿算哪儿，不是为了学校，不是为了教育部，更不是为了他们的钱。

三十余年，弹指一挥间，我居然写了不少东西。本来就是加速度，缓慢上升，2000年后，突然提速，和生理水平相反（我的记忆正加速流失），回头一看，吓了一跳。

以前写得少，名气小，出版难，不是主要原因。主要原因是，为了单位和学术界，为了领导和老同志，为了“媳妇熬成婆”，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。

后来，等我终于“熬成婆”，我觉得非常失落。为了会议，为了评审，为了各种固辞再三不得已的“红白喜事”，我还是一样身不由己。我问自己，难道你就这样下去吗？

早晨，到清华散步，站在王国维的纪念碑前，我常常想，陈寅恪说的“自由”到底是什么意思——“自由”不是白来的（The freedom is not free）。

我请人刻过一方印,印文是“小字白劳”。“零”的意思就是“白劳”。“白劳”就是代价。

“白劳”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,学界并不例外。

当年,我在考古所(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),年龄最轻,地位最低,当过小媳妇儿。我想告诉那些比我年轻的学者,当年的我,“白劳”是命中注定。

1976年底至1978年,考古所编《新出金文分域简目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),基础工作就两人,90%的卡片是我做的,10%的卡片是老刘(刘新光)做的,1978年底出版的那个油印本,我俩的名字还排在前面,但书印出来,却排在后面,排在“0%”后面。

1978—1981年,考古所编《殷周金文集成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84—1994年),我参加过最初的资料准备,书要一本一本对,拓片要一张一张找,除了室内整理,还要到各大博物馆拓铜器,我为此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,名没有,书没有,什么都没有。老刘说,你为这书付出那么多,别人装糊涂,我知道,留个纪念吧。她把她的《集成》送给了我。

1981年,我在西高泉挖秦墓,70多座墓,就三人,老卢(卢连成)、陈平和我。1982年,我在沔西挖西周遗址,也是跟他们在一起(还有郑文兰)。最后,我和陈平调走,老卢也离开了考古所。我的一切辛苦和劳累也“雨打风吹去”。

俞伟超先生知道我的经历。他说,你的时间并没白费,所得还是胜于所失。

真是这样吗?破涕为笑吧。

我调过两回工作,早就没有归属感,经历使然,教训深刻。我已看穿看透,与其“从一而终”,不如“移情别恋”。我才不死心塌地跟谁干,特别是有如“修长城”的浩大工程和集体项目。

摧眉折腰,我不开心;呼奴使婢,也不乐意。最好的选择,还是自己领导自己。

我是单枪匹马惯了,喜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四面出击,其实只有一

条枪。

杂文不谈了。学术,涉及三个界:考古、古文字、古文献。“三古”是基础学科,我重视,我喜欢,但对我来说,这是训练,不是目的,我更关心的是问题。三代无学科,问题并不属于哪个“古”。更何况,我是现代人,我的立足点还是现代。

三十多年来,跟着问题跑,一个问题牵出另一个问题,我还涉及过很多行当,至少有五六种。研究《孙子》,涉及军事史;研究方术,涉及科技史和宗教史;研究简帛古书,涉及思想史;四出访古,涉及历史地理;研究文物,涉及考古和艺术史。虽然,这些行当,没有一行是我的“本职工作”,但不同领域的学者都还承认我。

人文学术,所有文科系,我都插过一脚。我甚至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艺术系教过书。

孙悟空语录:“超出三界外,不在五行中。”

我把这两句抄下来,挂在墙上。

他是中国的自由神。

书不在多。

一个诗人写一辈子诗,最后能有一首诗被人记住就不错了。

书也是这样。

但这需要以勤补拙,需要投入较多的精力。谁都只有一条命,我不比别人聪明。书都是逐渐写薄的,为了薄,先要厚,厚积才能薄发。

我是个按计划写作的人,单篇文章是为了编书,编书是想讲出点儿道理。其实,我做的一切,都只是铺垫,不管是为自己铺路,还是为他人铺路。

研究学术,我是从文献整理入手。最初,我是拿《孙子》练手。这方面的文章已收入《〈孙子〉十三篇综合研究》(北京:中华书局,2006年)。

后来,我迷过一段古文字,深陷于拓片而不能自拔,没有一帮老同志帮忙拔,我还拔不出来。根儿都拔掉了,剩下的只是训练。

再后来,跑国外,我是靠方术屠宰时光。最初是写散稿,然后才汇编成书。《中国方术正考》、《中国方术续考》是这么写成的。翻译高罗佩的《中国

古代房内考》，也是配合这一研究。

研究简帛，我也有个准备过程。比如写楚帛书，写郭店简，写上海简，我花费了不少时间。特别是上海简，很多精力都白费了，我很后悔。所幸，我还写了一本《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》，这书是为了讲课。

我在学校讲经典，也是先讲后写。比如《丧家狗——我读〈论语〉》、《兵以诈立——我读〈孙子〉》，还有四本一套的《我们的经典》（已经印出三本），就是从课堂而来。

历史地理，我也写过一些文章，还没编。

访古，有不少日记和照片，也要整理。

考古和艺术史，我一直在写。老文章多已收入《入山与出塞》，新文章还没编；我还写过一本《铄古铸今》。

这些都是铺垫，为了我心中的学术。

本集所收，是我的学术论文，不是全部，只是上述集子（已编或待编）以外的散稿，侧重点是文史方面。我讲历史的文章，差不多都收进去了；文字方面也选了不少（不是全部）。

十年前，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过我的论文集：《李零自选集》，就是此书的基础。现在有所删削，有所增补，有所订正，分为两册，一册读史卷，一册说文卷。

这两册书，只是过河的石头。

语云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其实，就是圣贤，也不能不出错。过去，我说过一句大实话：“天地之间最没有常识的一件事就是认为别人没有常识。”（《花间一壶酒》，北京：同心出版社，2005年，216页）

我也曾经年轻。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老想不明白，好些年纪一大把、头衔一大堆的人怎么也会犯错误，而且是最低级的错误。他不明白的道理，其实最简单，再大的学者也是人，是人都会犯错误。

人为什么会犯错误？这门学问可大了去。研究错误是一门大学问，报上

说,国外有这门学问,国内则未之闻也。

错误,意必固我,是人都会犯。累,会犯;忙,会犯;年轻,有精力没经验,会犯;年老,有经验没精力,也会犯。怎么都会犯。光是生理、心理、气质、性格上的原因就有一大堆。记忆力差,思维跳跃,推理过度,联想失控,也是陷阱。

错误是人类认识的一部分,而且肯定是绝大部分。黄金不可能比沙子多。

我知道,我的书,错误一定很多。我不是精密仪器。

不犯错误不是人。机器才不犯错误(要犯也是跟着它的主人犯)。

错误分两种,一种是大错误,在总体认识上犯错误;一种是小错误,在字词、标点、引文等各种细节上犯错误。前者是探索性的错误,成亦萧何,败亦萧何,不一定能以对错论功过,如果它是为大问题当“靶子”,能以自己的失误,启发别人,引起争论,引起思考,很可能是成功之母、正确他爹。后者,一般叫“硬伤”,错就是错,不容商量。这样低级的错误,当然应尽量避免,却最不容易避免。

这次编书,我只对后者做一点订正,不做大修改。认识上的纠正,写在补记中,也只限非说不可、不说就可能误导读者的地方。我对别人的错误没兴趣,自己的错误也不想十步九回头,不断找补。无论大错误还是小错误,都只是当作一种认识过程来反省和检讨。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就让它付诸东流吧。

不过,有件事,我倒有点后悔,即过去发表的论文,脚注不周密、不统一,对读者查核原文不方便。这部分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过程,部分是因为我国的学术界原本就没规矩。刊物,吝惜版面,往往求简,有人甚至认为,脚注太繁是为了骗稿费。关于这方面的认识,我在《入山与出塞》(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4年)的后记中有详细讨论,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。

这是我的回顾与检讨,是为序。

2009年12月23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

目 录

自 序 / 1

文字考释

文字破译方法的历史思考 / 3

为《说“引”字》释疑 / 13

古文字杂识(十五则) / 16

西周甲骨

读《周原甲骨文》 / 45

读周原新获甲骨 / 88

商周铜器

“车马”与“大车”(跋师同鼎) / 99

重读史墙盘 / 106

论夔公盨发现的意义 / 133

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遂诸器 / 152

冯伯和毕姬 / 169

东周铜器

春秋秦器试探 / 177

读小邾国铜器的铭文 / 191
楚郢陵君三器 / 204
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 / 212
楚燕客铜量铭文补正 / 259
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 / 264
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 / 307

简帛和战国文字

读《楚系简帛文字编》 / 315
读九店楚简 / 349
读上博楚简《周易》 / 365
说清华楚简《保训》篇的“中”字 / 392
读清华简《保训》释文 / 397
视日、日书和叶书 / 404

文字考释

文字破译方法的历史思考

一般对古文字研究缺乏了解的人,常常会对文字破译有各种误解。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又起新旧之争,虚构了许多新旧对立。像“宏观阐释”与“考据学”的对立就是其中之一。在他们看来,文字破译是老掉牙的“传统思维”,与“宏观阐释”毫不相干(楼上楼下,不在一个层次)。前者是靠大处着眼,假设先行,而它靠的却是精雕细刻,积沙成塔。

事情是不是这样呢?我想未必是这样,或者至少说不完全是这样。

一、“肺腑而能语,医师色如土”

朱德熙先生喜欢讲一句话,就是文字破译最像侦探破案。这个比喻很形象。

文字破译与侦探破案的相像之处,首先是它很重想象,有时能像福尔摩斯,凭蛛丝马迹,就把案情弄个水落石出。虽然现在有不少学者都在总结古文字的研究方法,特别是对文字的结构分析(偏旁分析),声旁啊,形旁啊,六书呀,三书呀,很重视,从中归纳出许多规律。但我们学这些东西,又用这些东西教人,常常免不了会有“纸上谈兵”的感觉。因为它很难解决的是“运用之妙”。

古文字学的“运用之妙”是什么?是想象。而想象总是包含了猜测的成分。以至有人老是把文字破译当作猜谜射覆、智力游戏,以为这是一个可以

凭想象力“跑马”的自由领域。

1955年,中国的考古学家在安徽寿县发掘过一座蔡侯墓,在当时很轰动。这个蔡侯是谁?本来出土铭文是写明了的:他的名字叫𢇛。但这个名字很怪,谁也认不出来。没办法,大家只好猜。怎么猜呢?我们都知道,蔡国迁都寿县,只有五代就灭亡了。也就是说,大家只能在这五个蔡侯或略早的蔡侯中选择。而当时也真的就有六七种意见。实际上是把所有可能都占全了^①。这种情况在研究早期中国的各个领域都很常见,说得好听是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,说得不好听是“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”。

对于想象力的充分运用,各种假说的并存也许是一种补偿。中国话叫“平分秋色”。说实话,干我们这一行,有人希望的就是这种情况。“无头公案,死无对证”,对真正的侦探当然是不幸,但对侦探小说的作者反而是好事。因为他正好可以借此编各种“推理小说”,调动读者的想象。在这方面,我们碰到的情况与宏观阐释并没有两样。大家一样是“大处着眼,假设先行”。但问题是你怎么证明你的想法呢?在有些人看来,证明并不是去发现事实,而只是为自己的假设铺设逻辑轨道,中国话叫“自圆其说”。他们觉得空白越多,自由度才越大。所以还专挑年代早、线索少的字来考。讲战国秦汉还小心一点,越往前胆子越大,甚至以为文字破译要比其他领域更多想象余地^②。

事情真的是这样吗?

其实,我看情况正好相反。因为文字破译要回答的是简单事实,就像拿破仑死于哪一年,这个问题是不可以争论的。它的答案只有一个,对就是对,错就是错,比起各种复杂的阐释系统,反而最少选择余地。虽然在线索不明

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》,文物出版社,1984年,303页。

② 《金文编》王国维序强调“阙疑”,但郭沫若不以为然,讥为“懒汉思想”。其实这个词可做正反两面理解。从肯定的方面讲,它是一种必要的慎重。西方法律讲究“无罪推定”,即在正式判决前,先要假定被告无罪。中国古代治学讲究“阙疑”,也是害怕冤枉古人。考证古文字虽非“人命关天”,但也不能乱造“冤假错案”。

的情况下,想象总是不可避免,但这和文字破译的答案是两回事。文字破译的答案也许我们不知道,就像“历史真相”,可能永远是个谜,但这正像你的童年经历,即使回首如梦,什么也记不清,但不能随意编造。破译文字胡猜乱蒙,最大克星是地下出土的新材料。中国有句老话,叫“肺腑而能语,医师色如土”。地下发现一出来,很多猜测都要扫地出门,这是件很不客气的事情。比如上面这桩公案,真相大白是在20多年以后。真相一出来,众说并存的局面就被打破,剩下的其实还是一个答案。

下面我就来讲讲这个答案。

这个答案是“申”字。它的认识有一个过程。

(一)70年代,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编钟,铭文提到各国钟律。这些国名中恰恰就有这个字。当时裘锡圭先生参加整理,马上就想到以前碰到过这个字。虽然这个字的出现,在辞例上也是孤立的,但是它却把认识范围一下子缩小了许多。因为现在情况与以前已有很大不同,以前大家的猜测哪个是对的,现在必须符合新的条件,即它必须是东周时期常见的一个国名,而且这个国名又可排除在铭文所见的其他国名之外。在这种线索的启发下,裘先生猜测,它很可能是申国的申字。也就是说,上述各说,只有陈梦家先生的蔡昭侯(名“申”)说是对的。

(二)这个猜测是不是对,还要拿出结构分析的理由。过去在西周金文中有个𠩺字。这个字常见于册命金文。古代实行世官制,父死子继,在手续上要经过重新任命。遇到这种场合,铭文常常会说:从前先王曾命你的祖考如何如何,现在我又“𠩺稟乃命”如何如何。前人曾把这个字释为𠩺,以为𠩺是形旁,与系相通;耑是声旁,与重同从东得声,辞义是继续的意思。但裘先生在提出上述猜测时,产生了另一个思路。他认为上述难字与这个字是同一个字,但并非从东得声,而是从田得声。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。因为第一,古代的陈齐,汉代人叫田齐,陈与田古音相近;第二,陈字虽然从东,但并非从东得声,其古文写法是𠩺,说明与申读音相近;第三,古人讲重复旧的命令恰恰是用“申”字(即“三令五申”之“申”)。这也就是说,“申”字的古体是从田声(《金文编》2204的“𠩺”字与2113的“𠩺”字是同一个字),严格讲是

假“绅”字为之^①。

(三)过去,裘先生提出他的新解,很多人不相信。但古代的申国在河南南阳。80年代,南阳地区先后出土了申公彭字瑚和南申伯太宰的铜器。铭文“申公”是楚灭申之后所设的县公,见于《左传》;“南申”则是周宣王所迁封,见于《诗·大雅·嵩高》。这些铜器铭文中的“申”字就是写成“𠂔”。它们证明,裘先生的说法是可以视为定论的。

这个例子在文字破译中很典型。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成功的破译。我认为,一个成功的破译,无论多么巧妙,总还要靠一定的线索。说得不好听,就是还要靠一点“老天保佑”。因为没有线索,你的想象也就无所附丽;没有线索,你的猜测也就无法证实。这种线索有时也许并不能直接逼近答案,但它可以缩小问题的范围,使你不至于面对无数可能,好像大海捞针一样。这样的价值也是很大的。

二、几点反“常识”的经验之谈

在实际破译过程中,经验常常是最好的老师。所以我想选几个实际的例子,对破译方法做一点描述。

(一)越是看着相像,可能反而越不是这个字。

辨识古文字,入手处总是形体线索。一般人认为,破译文字,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它与哪个字相像。但这个方法失败的可能也很大。过去中国唱戏的有个对联,上联是“是我非我,我是我,我又非我”,下联是“装谁像谁,谁装谁,谁就像谁”,这是讲演技的乱真。古人留下文字,虽然并未使出什么“障眼法”,故意要难为我们,但这里面疑似之间,扑朔迷离的情况确实很多。一个字和另一个字也许只有一点点不同,你可能会忽略它,或宁愿迁就自己的想象,

^① 裘锡圭《史墙盘铭解释》,《文物》1978年第3期;《笔谈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〉》徐青松发言,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》1980年第2期;裘锡圭、李家浩《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说明》,《音乐研究》1981年第1期。

不肯去承认它,但这一点点不同往往就是至关重要的。你越是看着它像这个字,它往往越不是这个字。正合得上所谓“差之毫厘,谬以千里”。例如:

(1) 𠂔(弘、引)[毛公鼎] 弘(弘)[史墙盘“弘”字所从]^①

(2) 𠂔(豐)[朱家集楚器] 𠂔(铸)[朱家集楚器]^②

(3) 𠂔(愆)[朱家集楚器] 𠂔(盥)[蔡侯申缶]^③

这三组例子,左边一字过去都被误释为右边一字,新版《金文编》甚至把(2)(3)的左右两字按误释同时收入。类似的例子还很多。

这种形近误释之所以值得警惕,有两个重要原因,一是古文字中凡与小篆比较变化不大的字,前人多已认出;二是古文字的讹变往往变化莫测,特别是战国文字,有些讹变简直莫名其妙。例如曲作𠂔,与匕难以分辨^④;冶作𠂔,与侃极为相似。现在北京有些商店把“罐头”写成“缶头”,你要单把“缶”字挑出来,恐怕永远也不会想到它是读为“罐”。战国文字怪起来,有时就很接近这种程度。

对于防止形近误释,反证很重要。一个字的破译有时不仅要证明它是什么字,还要证明它不是什么字。像上面的右边一字就都是反证。

(二)线索不够,最忌“空白想象”。

对文字破译,想象很重要。但想象的掌握很难,常常会“溢出”事实的边缘。对有些事,你铆足了劲去干,就一定会有好处,但想象可不一定。我在前面讲过,文字破译的答案很窄,角度一偏,就会落空。而人脑有个规律,它在空白的地方一定要想象,而且一旦想开来,就很难停止,会弥漫扩散,“登山则情满于山,观海则意溢于海”。你原来没这个想法还好,有了就很难去掉。它会引导你,让你越想越像,一条道走到黑,结果当然是南辕北辙。

例如我们都知道,文字破译经常使用缺文。古人语短,只要缺文有四、五

① 于豪亮《说“引”字》,《考古》1977年第5期。李零《为〈说“引”字〉释疑》,《古文字论集》(一),《考古与文物丛刊》第2号。

② 李零《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9辑。

③ 李零《释“利津𠂔”和战国人名中的𠂔与𠂔字》,《出土文献研究续集》,文物出版社,1989年。

④ 李零《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8辑。